

---

# 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赵淑玲 李宗远

---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史学会、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举办的“纪念七七事变 6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1997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中国海峡两岸和香港特区以及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 10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 80 多篇。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伟大的转折》的主题报告。

在为期 3 天的讨论会上，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以下分别论述。

## 一 关于七七事变的发生、发展和国际影响。

关于七七事变的发生。臧运祜运用日方资料，对 1936 年至 1937 年上半年间的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政策经历了“确立—调整、失败—再调整、再失败—再确立”的演变过程，从而揭示出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杨韶明利用“满铁”档案，首次披露了“满铁”参与卢沟桥事变的事实，指出“满铁”在事变中充当了侵华日军的“运输部队”、“铁道野战部队”、“医疗部队”和“金融后盾”。

关于事变期间的中日交涉，蔡德金、荣维木认为，冀察当局与日军的“现地谈判”和国民政府与驻华使节的“南京交涉”同时进行，由于两者不能统一，中国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日军则达到迅速

占领平津的军事目的。他们还分析了冀察当局与国民政府不能统一步调的原因。曾景忠认为,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冀察当局作了一系列应战督导,督导内容包括固守备战、决心抵抗、与中央政府团结一致、宋哲元速离平津 4 个方面。

关于七七事变的国际影响,王真认为,七七事变在客观上已经超出了中日战争范围,它不仅是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从战略上看也是针对轴心国集团的;它改变了远东战略格局,影响到国际力量的重组,奠定了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的基础;二次大战是欧洲战争与亚太战争的合成,作为亚太战争组成部分的中日战争爆发在前。因此,七七事变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 二 关于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沈予对 1937 至 1941 年近卫内阁在所谓“国际正义论”下的对华政策、策略的演变和实质做了深入分析。熊沛彪对“协合外交”、“佐藤外交”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提携政策”的实施及其实质做了阐述。余子道论证了 1937 年至 1941 年日本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分为“逼其悔悟”、“不为对手”、“促其合流”3 个阶段,揭示其亡华灭华的基本政策是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学者们认为今后应加强对日本侵华政治谋略、侵华人物等问题的研究。

## 三 关于正面战场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以往对正面战场的研究相对薄弱,导致人们的认识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今后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应侧重具体的问题。在讨论会上关于正面战场的个案研究有下面几种。

关于徐州会战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史学界说法不一。马仲廉认为会战开始时间决定于中日两军何时决定在徐州地区决战和何时开始作战行动,而首先应该考虑作为进攻一方的日军的决定和行动。会战结束时间应以按作战计划达到作战目标,并停止作战活动为准。据此,徐州会战的起止时间为 1938 年 4 月 16 日至 6 月 6

日。1938年3月16日至4月7日的台儿庄战役不是徐州会战的一个阶段,而是单独的战役。

林治波对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作用及其对战役进程的影响做了深入剖析,认为汤在战役中存在违背军令、保存实力、拖延战机的问題,致使台儿庄战役进程被延误一周之久。汤的作法开了国民党内部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恶劣先例。

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緬作战,学者们一致认为中緬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同盟国其他战场作战。台湾学者刘凤翰将中国远征军入緬作战的经过划分为两个阶段、三个战场、三种任务。这种划分进一步明确了远征军入緬作战的经过,有利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 四 关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

抗战时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抗战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与会学者认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最终动机应从经济方面来考察,因此要加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研究。

关于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掠夺与统制,曾业英从4个方面考察了日伪统治时期华北农村经济状况,即日本与华北农业资源的关系;日伪的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失败;日伪对华北农业资源的统治和掠夺;日伪统治下的农民负担。居之芬从政治、经济、地理等不同环境条件,阐述了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与其对东北经济掠夺的相同和不同特点。

#### 五 关于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

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提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世界化”,抗战时期的时代精神是“中国化”。中国现代文化从五四时期到抗战时期的发展,走的是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回归之路,它既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困惑。这一观点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韩国学者裴京汉也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他对汪伪政权发行的3份杂志进行了分析,认为汪精卫及其追随者利用孙中山的大亚

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利用,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香港学者李国成对抗战时期香港的中文报业作了论述,将其分为3个阶段,即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萧条时期;抗战中期(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是兴隆时期,沦陷期间(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是黑暗时期。这种划分客观地反映了香港中文报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历史。

## 六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是不容抹煞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的一些政要和极右翼势力不仅不对其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恶历史进行反省,反而进行百般抵赖和否认。把对中国入侵,说成是“进入”;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虚构”;把强迫亚洲妇女去当慰安妇,说成是“商业行为”;把强征平民到日本去服苦役,说成是为了“赚大钱”;掩盖活体细菌试验,发动细菌战的事实,把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说成是“不公正的审判”。所有这些战争遗留问题,都成为本次学术讨论会的热点问题。

高兴祖认为,70年代以来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有3起重大事件,即70年代开始散布“无稽之谈”说,80年代大肆鼓吹“虚构论”,90年代通过法院来抹煞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

苏智良认为,日军正式推行慰安妇制度是以1937年12月松井石根的华中方面军建立杨家宅娱乐所为标志,直到1945年8月日军战败。慰安妇的人数不少于36万至41万人。其中中国慰安妇总人数约20万人。旅日华侨林伯耀对1942年至1945年日军强迫天津妓女做“性奴隶”的事例进行了剖析,以事实驳斥了慰安妇“不是强制的”,日本“军方没有参与”、“是行内人带来的”、“是商业行为”等谬论。

关于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问题,何天义认为:日本侵华期间,强掳中国战俘达4万人;日本政府是强掳中国战俘劳工的决策

者组织者;日本军队是抓捕者关押者;日本企业是倡导者使役者;日伪政权是参与者协助者。

郭成周对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史实,作了调研报告,指出细菌战是日本亡华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国被害军民达数十万人之多。日本学者森正孝对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行进行了揭露。

台湾学者李恩涵对1931年—1945年日本在华北的毒化政策和贩毒活动进行剖析,认为1937年—1945年间日本在华北售毒所获纯利润合美金3.3亿(当时美金币值),此款如用以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载重量达25675吨,可载飞机84架之翔鹤型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则每年可建2.05艘,8年期间的售毒利润,则可建16.44艘之多。

抗战时期日本和伪政权在沦陷区发行了大量公债。这些公债是日本为支撑战争而发行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基本没有兑现。戴建兵统计,抗战胜利后,这些公债如按票面计算达471亿日元。这些公债散失在民间,也成为战争遗留问题之一,应是向日本索取赔偿的重要证据。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也是战争遗留问题之一。李宗远等根据所挖掘的资料,对关押在抚顺和太原的1069名战犯的改造经历进行了分析,深入探讨了新中国政府关于处理战犯的法律制定、对战犯的教育、改造等问题,认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是成功的,这表现在1956年这批战犯被释放归国后,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该会成为战后日本国内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

与会者还认为战争遗留问题难以彻底解决,与日本某些学者的历史观不无关系。日本著名学者安藤彦太郎教授认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分为古典研究和现代研究两个领域。其中古典研究被赋予了学术地位,现代研究则被视为“调查”。卢沟桥事变前后,这种“调查”似乎呈现了“研究”的样貌,同时,为实施战争发挥了作用,这是一种矛盾。他认为,为了树立“正确的历

史认识”，有必要用批判的态度研讨这一问题。

日本学者田中宏也认为：日本存在着“自由主义观”等错误的历史理论，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展开的争论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下去。香港学者杜学魁则介绍了海外华人向日本讨还公道的活动。

### 七 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

与会学者对当前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深表忧虑和愤慨，并对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美籍华人韦玉华运用大量史料证明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多数学者认为钓鱼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政治问题。历史学家要为现实政治服务，政治家更应尊重历史。日本学者井上清认为，钓鱼岛问题涉及到国际法。日本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把钓鱼岛看成是无主地，认为按照国际法，谁最先控制它，它就归属于谁。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对钓鱼岛实行有效的控制，而日本实行了有效的控制，所以钓鱼岛应归属于它。井上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史书早在16世纪就明确记载了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所以钓鱼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来自美国的陈究中先生说，日本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说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台湾方面对此非常冷漠，中国外交部虽多次发表维护领土主权的声明，但日本并未改变立场，其右翼势力还与美国合作推出“中国威胁论”，暴露了其并没有放弃称霸亚洲的野心。

除上述方面外，学者们还就第二次国共合作、敌后战场、地区抗战史、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李良志在评论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前形势的分析时，认为其确有不准确和失误之处，表现在一开始对蒋介石政策的黑暗面和危险性估计不足，既而又过于乐观，造成方针政策上的失误。这一观点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杨天石根据台湾所藏档案，对国民党系统在上海地区敌后工作情况——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敌后抗日工作进行了考察，认为其工作范围仅限于工商界、新闻界、文教界，未能将上海的敌后抗日工作统一起来，同时还有与共

产党闹摩擦的一面,但其主要斗争矛头是指向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的,应给以肯定评价。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宛平城等七七事变遗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后重新布展,其综合馆、日军暴行馆、人民战争馆、抗日英烈馆,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好课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责任编辑:荣维木)